



浙江省第十届哲学社会科学 优秀成果奖获奖成果集

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 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浙江省第十届哲学社会科学 优秀成果奖获奖成果集

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 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浙江省第十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获奖成果集/
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编.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 12

ISBN 7-5004-4816-3

I. 浙… II. 浙… III. 哲学社会科学-文集 IV. 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124484 号

责任编辑 宗 合 谢 力

责任校对 林福国

封面设计 新空气

版式设计 王炳图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3 传 真 010—84017153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奥隆印刷厂 装 订 三河鑫鑫装订厂

版 次 2004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 × 1092 毫米 1/16

印 张 37 插 页 9

字 数 831 千字

定 价 80.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著作类

一等奖

- 浙江制度变迁与发展轨迹 方民生等 (3)
- 朱熹年谱长编 束景南 (6)
- 浙江佛教史 陈荣富 (9)
- 从宪法规范到规范宪法：规范宪法学的一种前言 林来梵 (13)
- 世纪之理想——中国近代义务教育研究 田正平 (15)
- 中国饮食史 徐海荣 徐吉军主编 (17)
- 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志 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编纂 (18)

二等奖

- 国际区域产业结构分析导论——一个一般理论及其对中国的应用分析 汪 斌 (31)
- 朱子理学美学 潘立勇 (34)
- 科学的精神——当代西方科学哲学中的认识论问题研究 郑祥福 洪 伟 (37)
- 企业家角色人格——对企业家的哲理思考 吕福新 (42)
- 城市化过程中的耕地保护问题 钱文荣 (45)
- 我国商事主体法律制度研究 阮赞林 (48)
- 世界蚕丝业经济与丝绸贸易 顾国达 (50)
- 美学新概念——21 世纪的人文思考 徐 岱 (53)
- 英国小说批评史 殷企平 高 奋 童燕萍 (54)
- 无根基时代的精神状况——罗蒂哲学思想研究 张国清 (58)
- 明清时期太湖流域的商品经济与市场网络 陈学文 (60)
- 一个村落共同体的变迁——关于尖山下村单位化的观察与阐释 毛 丹 (61)
- 六朝诗歌语词研究 王云路 (63)
- 中国政府管制体制改革研究 王俊豪 (64)
- 唐代西州土地关系述论 卢向前 (66)
- 永续发展——企业技术创新透析 陈 劲 (68)
- 利率自由化：并非自由的选择 赵英军 (69)
- 青瓷与越窑 林士民 (72)
- 汉画像的音乐学研究 李荣有 (76)

转型时期的中国当代文学思潮	吴秀明 (78)
走出审美城：新时期文学审美论的批评性解读	杜 卫 (81)
自由主义批判与自由理论的重建——黑格尔政治哲学及其影响	郁建兴 (84)
继承与创新：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	詹真荣 (87)
政治监督论	陈国权 (90)
中华早期和合文化	杨建华 (94)
马克斯·韦伯：文明与精神	冯 钢 (98)

三等奖

宋代唐诗学	傅明善 (103)
金元词通论	陶 然 (107)
环境经济手段研究	沈满洪 (110)
唐宋词社会文化学研究	沈松勤 (114)
抽样估计精度问题研究	李金昌 (117)
丧葬史	陈华文 (119)
日本文化——模仿与创新的轨迹	王 勇 (122)
甲骨文动词语义研究	陈年福 (123)
智者的沉思——老子哲学思想研究	朱晓鹏 (125)
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法律环境研究	范柏乃 (130)
危机与出路：中国粮食结构与农业发展新论	杨万江 (132)
近代法国工业化新论	沈 坚 (136)
杜诗句法艺术阐释	孙力平 (138)
文化语义学	马清华 (142)
市场经济与政府职能	何力平 (144)
国际保理法律与实务	朱宏文 (147)
农业发展中的政府干预	卫龙宝 (151)
中国现阶段非公有制经济研究	张宗和 (153)
医学与文化（系列三册）	余凤高 (154)
编辑学理论研究	吴 飞 (157)
王畿评传简介	方祖猷 (162)
中国高速增长地区的经济发展——关于江浙模式的研究	陈建军 (166)
普通方志学	韩章训 (172)
山区社会学引论	李明华 (175)
现代社会发展中的形象冲击	马志强 (180)
神圣的渴望——一种宗教哲学	王志成 (183)
《马氏文通》虚字学说	陈月明 (186)
教师人格论	王荣德 (189)
鲁迅小说的形式意义	叶世祥 (191)
浙江 20 世纪文学史	王嘉良 (193)

21 世纪语言文字应用规范论析	王建华	(196)
开放的地区主义与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宋玉华等	(200)
市场精灵——网络传播与广告	卢小雁	(203)
美学建构中的尝试与问题	阎国忠	(207)
数学文化与数学课程	张维忠	(211)
中国人的人格结构	杨波	(213)
政治格局中的私营企业主阶层	董明	(216)
禅宗美学	张节末	(219)
超凡脱俗的个体自觉——塞涅卡伦理思想研究	张静蓉	(222)
二十一世纪：中国中小企业的发展	罗国勋	(224)
茅坤研究	张梦新	(228)
邓小平经济理论与实践	陆立军	王祖强 (230)
国际直接投资发展研究——浙江“引进来”与“走出去”的 发展战略	程惠芳	钟山 (232)
中国转型期国债的金融分析	陈时兴	(234)
一体化德育实验探新	黄黎明	(237)
两宋道学命运的历史考察	关长龙	(240)
街亭丛考	徐日辉	(244)
鲁迅家世	张能耿	张款 (248)

论文类

一等奖

论文化的超越性功能	陈立旭	(251)
礼的起源——兼论良渚文化与文明起源	陈剩勇	(262)
经济宪法学基本问题	赵世义	(280)
投资流向与结构调整、结构升级的关联分析	何大安	(290)
论马克思的社会解放理论与现代民主政治的构建 ——兼论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的相互关系	胡承槐	(299)
汉语奇偶句调型的组合模式	吴洁敏	朱宏达 (306)

二等奖

中国加入 WTO 与浙江省产业结构优化及提高产业竞争力研究	孙永森等	(319)
从 ROE 的实证分析看上市公司的业绩操纵行为	靳明	(329)
论新时期我国政府规制的改革	胡税根	(335)
国际私法上的公共秩序研究	金彭年	(344)
论可持续发展的人文限度及其超越	陈华兴	钱杭园 (358)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性质的探讨	丁关良	(365)

中国商会史研究之回顾与反思	冯筱才 (374)
经济学视野中的人类道德——现状·假说·模型	叶航 (399)
中国教育离现代化目标有多远	杨明 (405)
制度兼容与经济绩效	金雪军 章华 (412)

三等奖

世界新格局与中国发展的关键 10 年	马庆国 (421)
社会分层与社会秩序——对当代中国现实的考察	王小章 (425)
论语文教育的四大关系	王松泉 (437)
跨世纪浙江产业布局的回顾与展望	倪树高 (442)
体育产业若干界说的辨析及相关问题的讨论	丛湖平 (450)
法律家的技能与伦理	孙笑侠 (457)
《堂吉珂德》的多重讽刺视角与人文意蕴重构	蒋承勇 (473)
先秦儒家人性论的理论总结——儒家人性同一说的集大成	黄开国 (479)
试论《四库全书总目》词籍提要的词学批评成就	李剑亮 (487)
从旧兼从轻：刑法适用的“准据法原则” ——兼论罪刑法定原则蕴涵的程序法意义	阮方民 (495)
浙江实施“走出去”发展战略的比较优势与规模预期	赵伟 (506)
国营企业经营者分配机制研究	安蓉泉 (516)
在“四个多样化”条件下加强党的整合作用	蓝蔚青 (526)
民营企业需要再创新	张仁寿 (536)
企业兼并有效性评价方法研究	吕筱萍 (543)
对“中国进入后人口转变时期”的质疑	叶明德 (547)
加入 WTO 对外汇资本流动的影响及其对策	方志敏 张全兴 王去非 (554)
《高丽大藏经》及其文献价值	颜冷茂 (562)
本科学历小学教育专业建设的探索与研究	卢正芝 (576)
论城市文化建设	赵力平 (581)

浙江省第十届哲学社会科学
优秀成果著作类奖

一 等 奖

浙江制度变迁与发展轨迹

浙江省社科院方民生教授等著，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浙江省社科规划“改革开放研究书系”之一，全书35.5万字，由绪论和5篇20章构成。

主要内容和基本观点如下：

绪论 简述浙江制度变迁的特点、发展轨迹的主要特征和本书撰写的结构与方法。

改革开放以来的20年，是浙江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20年，在这个过程中总是伴随着制度的变迁，其特征是：在制度创新需求与实际制度供给均衡点的区间选择产权制度的安排；制度变迁在创新成本最小的地方开始突破和实施；以混合型的制度变迁路径为演化模式；制度变迁总是围绕着塑造新的市场主体展开；以诱致性创新为主动力的创新动力结构。在浙江的许多制度创新，都是民众先干起来，并大大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然后才有政府的文件加以支持和推广，都是诱致性制度变迁的产物；当然，政府在制度创新中的作用也是不可低估的，政府提供了制度变迁所必需的组织协调与必要的制度供给，有时还充当了中央与民主基层组织之间的缓冲器，有时采取视而不见、默认的态度，并创造性地运用有限的政策工具给予支持。浙江制度变迁的“第一行动集团”是民众，地方政府只能起“第二行动集团”的作用，这两个行动集团的共同努力才能顺利地实现制度变迁。

浙江改革开放20年来，经济发展速度是罕见的，其发展轨迹的特征表现为：国内生产总值的变动呈陡峭式的曲线增长；经济发展轨迹与制度变迁一致；经济增长周期与宏观经济环境密切相关；经济结构的演进与经济发展阶段密切相关；经济发展进程的差异取决于政策选择。浙江经济的超常规增长，功在独特的制度变迁模式，释放了生产潜能，改变了运行机制，重塑了新的发展环境，这从发展的时间和空间上都得到了验证。

第一篇 浙江20年巨变。分析浙江是如何从经济小省跨入经济大省、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型、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从封闭型经济向开放型经济转变、从温饱型生活到小康型生活，并指出这些变化的实质是经济体制转型和社会结构转型。

第二篇 经济发展环境与动力。从经济发展环境的一般理论探讨入手，给出了“经济发展环境是各种经济资源和运行条件的综合体，并构成一种经济发展的潜在能量”的定义；对浙江发展环境作了实证分析，着重研究了浙江的社会背景和发展模式，从中得出了浙江发展环境的比较优势在于：第一，初始结构优势。在工业结构上，工业的行业结构是以轻纺工业为特征的，工业的规模结构是以小型企业为主的。这种结构符合20世纪最后20年市场对产品结构的需求，而小企业又比较容易适应市场的变化。第二，初始体制优势。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浙江国有企业少，因而国家的投资少，计划供应的物质资源和

产品少,这对经济社会发展是不利的,就当时的体制而言,浙江处于劣势地位。但是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时期,它就由劣势变为优势,因为国家的资源供给和控制力度都比较薄弱,这就迫使浙江企业从市场上去寻找原材料和销售渠道,也就有可能从计划经济最薄弱的环节突破原有体制的束缚,率先进行市场导向的改革。第三,社会文化的优势。浙江的文化是以传统文化和海洋文化相结合为特征的。传统文化方面,有古老文化积淀所形成的勤奋与淳朴的品格,有“利义并存”和“工商皆本”的思想遗产,有经商和“百工技艺”的传统;海洋文化方面,悠久的通商口岸使浙江人比较早的接受到西方文化和经营管理方式,比较早的接触西方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则,引来了海洋文化的新观念。第四,创新潜能的优势。在20世纪50—60年代浙江就有一批改革的先驱者,80年代的改革正是那时来自基层要求改革的继续和回声,后来在浙江的一系列思维创新、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都是蕴藏已久的这种创新潜能的发挥,这是浙江巨变的动力源泉。

第三篇 经济结构变迁与特征。从产业结构、产业布局、产业组织等三个层次分析了它们的演化过程及特征,以及对经济结构现状作出了评价和演进趋势的探讨。本书对20世纪末浙江经济发展阶段作出了判断,认为“浙江经济发展处于工业化中期”,其主要任务是加快产业结构升级,并对经济结构升级与发展现状的矛盾作了分析。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经济结构升级的战略对策:以产业升级和产业竞争力的提高为调整目标,以企业和企业家为实施调整的主体,以存量调整与增量发展相结合为调整路径,以培育大企业集团与提高小企业组织程度为调整的主要形式,以提高外向度为调整的加速器,以产业集中布局为调整的重要内容,以造就良好的产业发展环境作为政府的重要职责。

第四篇 市场体制演进的特征。从分析浙江制度变迁的演进路径开始,研究了市场体系发育的特点、主体构造与企业制度、政府行为与递进变革,从而对经济市场化程度给出了判断,对浙江市场化模式作了评论。浙江学术界有的从市场化过程和结构角度概括发展模式,有的从经营主体和市场配置角度概括发展模式,有的从工业化和市场化角度概括发展模式,都很有参考价值。本书在这一基础上,作了进一步描述,认为浙江主要依靠非国有企业,而不是以国有企业改革为主,来推进全省范围内制度变迁;浙江走出了一条先发展农村集体企业,然后发展个体、私营企业,形成了持续地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的路子;浙江主要依靠国内市场、国内资金,推进资本原始积累。浙江市场化模式可以概括为:内需启动、民间资本为主、经济民主、经济发展与制度变迁相互促进的,发展与改革之间良性互动的市场化模式。通过江、浙、粤三省市市场化模式的比较,相对于“苏南模式”和“珠江模式”,浙江的市场化模式更具有广泛的典型意义,因而更有推广的价值。

第五篇 再创经济发展新优势。在以上论述的基础上,对浙江改革与发展的基本经验作了概括,对浙江经济发展的若干基本问题作了探讨,对浙江21世纪初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前景作了预测性展望,并对加快现代化建设中的若干问题进行了探讨。

本书从制度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的角度,对浙江20年巨变的基本经验作了评述,认为思维创新是巨变最重要的动力源泉,重构市场主体是巨变的微观基础,加速要素流动是巨变的资源保障,区域特色经济是巨变的经济支柱,民众与政府的合力是巨变成功的保证。

对经济发展过程中一些还未取得共识的问题,作者发表了自己的见解,这些问题主要是:所谓“粮食滑坡”问题,作者认为“滑坡”是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也是符合广大

农民利益的；“第二产业的结构演进问题”，作者认为浙江应该跳出重化工阶段，而直接进入高加工度化阶段，这是浙江产业结构调整惟一可行的路径；“强县经济与中心城市问题”，作者认为20世纪80年代后期提出的“强县经济战略”已经过时，应代之以中心城市带动经济的战略，重视大城市的作用；其他还有“发展知识经济的策略问题”、“企业规模结构合理性问题”、“外向型经济发展的新问题”以及“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问题”等，本书都提出了值得关注的前瞻性观点和建议。这些年来的实践，证明了本书的见解是正确的。

本书最后对21世纪初的浙江经济发展作了前瞻性分析，对21世纪初浙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作了预测，对现代化进程作了分析与判断，认为就全省总体而言，2010年全省相当一部分地区可以达到基本实现现代化的“门槛”水平；到2020年，全省可以争取率先达到基本实现现代化的“门槛”水平。从现代化过程的整体素质看，科技、教育、生态和环境是需要特别加强的薄弱环节。知识经济的出现所带来的国民经济化、网络化、高技术产业的发展等，需要在现代化实践中引起高度重视。本书还对加快现代化建设中的若干问题作了探讨，提出要以加快现代化建设为导向，提高国民经济整体素质；以创新为中心环节，推进产业结构高度化；增强区域中心城市功能，加快城市化进程；实现改革开放新的突破，促进经济市场化和国际化；落实“科教兴省”战略，坚持可持续发展。浙江实现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的课题，就是要从全省综合考虑，建立生态平衡补偿机制，正确处理地区之间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平衡的协调关系。

按照这样的发展思路，提高浙江经济发展的素质和整体水平，争取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奋斗目标是完全可以实现的。到2020年，一个现代化的社会将在浙江大地上基本形成。

该书出版后，得到了学术界高度评价。专家认为该书的主要贡献是：第一，运用新制度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的理论，对改革开放以来浙江制度变迁的路径与经济发展的轨迹作了深入的分析 and 理论概括，从“经济体制模式转型”与“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的演进与互动中，揭示区域经济发展的规律，有理论价值；第二，从经济学的角度对浙江改革与发展的基本经验作了提炼，对“浙江现象”作了有理论深度的符合客观实际的诠释；第三，对浙江经济发展中曾经遇到和正面临的一些基本问题，作了有作者自己见解的探讨，这些问题也是区域经济发展中的理论前沿，有决策参考价值。

本书获2002年浙江省第十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著作类一等奖

朱熹年谱长编

浙江大学束景南教授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全书105万字，分上、下两卷。

《朱熹年谱长编》具有以下突出特点：

一、重原始文献，纠旧谱之误

千百年来，海内外研究朱熹的代不乏人，鸿篇巨制，汗牛充栋。但在作者看来，以往关于朱熹的研究大多满足于对朱熹进行气势恢弘的抽象理论建构，而在关于朱熹生平事迹、交游、出仕、思想演变与学术活动上都留下了不少空白。宋元以降，朱熹年谱所作甚多，《中国历代人物年谱考录》即收朱熹年谱57种（尚未全备）。较为重要的有朱熹门人南宋李方子所作《紫阳年谱》，南宋末王柏所作《朱子系年录》，明代戴铣所作《朱子实录》，李默所作《紫阳文公先生年谱》，清代洪嘉植所作《朱子年谱》，王懋竑所作《朱子年谱》等。这些年谱对记录朱熹生平学术活动各有特点和侧重，为研究朱熹思想提供了程度不同的参考，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但也存在着某些欠缺，不能令人完全满意。如李方子所作《紫阳年谱》，辑朱熹生平之言行，可供参考，然明时亡佚，后多被人窜乱，从中辗转抄袭；戴铣所作《朱子实录》，主于铺张褒赠，以夸讲学之荣，但于谱发明无多；李默所作《紫阳文公先生年谱》，由于李氏之学出于阳明，主朱、陆早异晚同之说，故对于旧谱多所窜乱，弥失其真；洪嘉植所作《朱子年谱》则过于简略，考辨有所不精；王懋竑所作《朱子年谱》虽较为精核，其钩稽朱熹生平事迹，辨别异同，记行事始末，纠旧谱阙失，多有创获，度越前人，是以往学术界研究朱熹的重要参考材料，但该谱也有缺陷，即在前人所作的旧谱中翻新，取李本、洪本等年谱相互参考，辨证旧误，订补错漏，而非自作新谱。

与上述所作比较，本书跳出了旧谱窠臼，不以旧谱为依据，从全面收集原始文献入手，直接就朱熹文集、语录等中，考辨朱熹生平行事。凡与朱熹相关的金石、方志、正史、杂史、政书、谱录、诗文、经注、道藏、佛经、召令奏议，作者无不擦集殆尽，所查阅的文献达3000种以上，而在本书中引用的至少有1500种。作者对这些资料进行分门别类、梳理整合、辨伪考订、去粗存精，不仅纠正了以往朱熹研究中的许多说错，而且填补了不少空白，为朱子学研究提供了可靠的思想史料。如王懋竑主朱学而攻阳明，回护朱熹，多产生偏见而失实。对朱熹早年好佛而求学于禅师宗杲、道谦，晚年耽道而作《周易参同契考异》、《阴符经考异》，均讳而不记，并判定朱熹文集中《答袁机仲》书为伪书，又认为《周易本义》中《易九图》、《筮仪》为后人窜入。本书在这些方面，对白田王谱之误都作了纠正。又如朱熹曾作《家礼》，见于李方子《紫阳年谱》所记，而王懋竑

未见《紫阳年谱》，竟以《家礼》非朱熹作而径删此条。本书从南宋真德秀《西山读书记》卷三十一中辑出《紫阳年谱》，《紫阳年谱》文中明言朱熹曾作《家礼》，以此本书纠白田旧谱之失（见《长编》第424页）。

二、客观求实，重学术演进脉络

朱熹作为宋代理学及经学史上宋学的集大成者，其思想受到佛教、道教的影响，这是一个客观的事实，他在批判地吸取佛、道思想的基础上，融合儒、佛、道三教，把中国文化发展到一个高潮。朱熹又以宋学义理及新儒学的天理为基本价值取向，吸取汉唐经学训诂注疏之长，去其沿袭墨守、忽视思想创新之弊，创造性地融合汉学与宋学，集汉学、宋学之大成，把中国经学发展到一个新阶段。然而，朱熹思想的最终成就，还是经历了一个发展演进的过程。《朱熹年谱长编》以客观求实的态度，从事实材料出发，把握朱熹学术思想发展演进的脉络，谱中所记，从朱熹早年、中年，到晚年，从初期诸种思想的提出、不定型，到中期的变化、成熟，再到晚年的定论，其间与同时代的各家各派学者相互交往，包括与理学各派、非理学各派、宋学各派，以及与佛、道学者展开相互辩难、相互借鉴、相互吸取，并提出己见，创造性地发展了中国文化。本书客观详实地记述了朱熹学术思想演进发展的全过程，同时展现了以朱熹为中心，中国文化在南宋时波澜壮阔发展的历史画卷。如朱熹早年曾从道谦禅师学佛，这对朱熹后来的思想影响甚大，而以往的年谱对此讳而不记。本书则详记此事，并在绍兴十四年条下作《道谦考》（见《长编》第87—95页），于绍兴十七年条下记朱熹寄书宗杲问禅，宗杲答书朱熹（见第107页），于绍兴二十二年条下记道谦卒，朱熹作《祭开善谦禅师文》（从《佛法金汤编》卷十五和《历朝释氏资鉴》卷十一中辑出，见第153—154页），据此可见朱熹向道谦学禅之全程。

朱熹经学是朱熹整个学术思想的基础和重要内容，关于这方面的记述，对研究朱熹十分重要，本书详尽记述了朱熹经学思想演变发展的全过程，其中包括朱熹的四书学、诗经学、易学、尚书学、礼学等组成朱熹经学的各个部分，为从事朱熹经学研究的学者提供了十分宝贵的资料。如对朱熹四书学思想的演进过程，本书依年代先后，详细考证了朱熹思想前后发生的变化，至最后走向成熟。先是朱熹于绍兴二十九年（1159年）草成《论语集解》，于绍兴三十年《孟子集解》稿成，后又作《大学集解》、《中庸辑略》。其后，于淳熙四年（1177年），朱熹经过修改，序定了《大学章句》和《中庸章句》，并写成序定了《大学或问》和《中庸或问》，同时也把《论语孟子集注或问》定稿，由此基本确立并构筑了一个以《四书章句集注》为代表的新经学体系。然而此时朱熹尚未把这四本书结集合刻，到淳熙九年（1182年），朱熹在浙东提举任上，首次把四书结集合刻，经学史上的“四书”之名第一次出现。四书合刻以后，朱熹又于淳熙十三年（1186年）对《四书章句集注》作了修改，修改后的改本分别由詹仪之刻印于桂林、赵汝愚刻印于成都。后来这个本子又作了较大修改，淳熙十六年（1189年），朱熹于把自己自淳熙四年以来发展成熟的新思想归纳进去，正式序定了《大学章句》和《中庸章句》，这标志着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的完成。这个序定本于绍熙三年（1192年）由曾集刻印于南康，流行一时，南康本成为朱熹生前《四书章句集注》流传行世的主要版本，后在庆元党禁中朝廷严令禁毁。后来朱熹对南康本又作了修订，而于庆元五年（1199年）朱熹逝世前数月刻版于建阳，这就是《四书章句集注》最后的定本。本书对朱熹的四书学思想作了详尽考证，使读者循时间先后，可知其思想发展演进的来龙去脉，又可得知在这个过程中朱熹与同时

代学者相互交往、相互促进,使朱熹思想走向成熟的情形,由此把朱熹置于当时的时代背景下,从时、空、人多维角度完整地展现了朱熹学术思想演进的脉络。

三、记事详尽,博考精审,重点突出

《朱熹年谱长编》以年代为线索,对朱熹整个一生的生平行事包括学术、教学、著述、政治活动,以及交友、唱酬、撰墓志铭等作了详尽的记述,是一部大型的全面记载朱熹生平活动的年谱。由于朱熹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著名学者,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大凡研究中国文化的人,几乎都要在朱熹那里涉猎一番,所以本书能够满足各方面人士的不同需要,这是本书的一大特点。此外,本书不仅记事详尽全面,而且对所记之事考证精密,钩沉索引,旁征博引,所引材料均注明出处,据实可信。并作到材料与观点相结合,使对朱熹生平学术活动具体事件与思想性质及其变化发展的认定,建立在事实材料的可靠基础上,既避免了主观推断而无确考,又不同于只罗列生平材料而无论断、缺乏思想深度的一些年谱。这与朱熹本人的思想实际相符合,从而体现出本书的学术价值和思想性。

本书不仅对朱熹生平行事、学术活动及思想作了全面详实的记述考辨,而且在此基础上,提纲挈领,把握重点,对朱熹一生的重要活动、重要学术思想、重大学术政治事件作了重点考辨,记述犹详。如对朱熹的早年涉佛、中和之说、乾道三年访张栻于湖南、诸经思想、朱陆之辩、朱陈之辩、人侍经筵、庆元党禁等等都作了深入而详尽的考辨记述。从这些重点记述中,足可见朱熹之为人、朱熹学术思想的形成与确立及其区别于其他学术流派的特点,以及当时的时代背景、中国文化在南宋时期以朱熹为中心的大发展。这对于知人论世、了解朱子学、理学、宋学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意义。

本书在附录中,附《朱熹著述考略》、李方之《紫阳年谱》(束景南辑)等,进一步体现了本书的思想史料价值。同时附有《人名索引》和《书名索引》,便于读者检索。

本书出版后,在学术界得到了极高的评价。任继愈先生评价说:“此书一出,李、洪、王诸谱可以束之高阁。此书,可以断言可传世也。”本书是作者朱子学研究三部曲中的最后一部,它对朱子学的研究将会起到重大的推进作用。

本书获 2002 年浙江省第十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著作类一等奖

浙江佛教史

浙江工商大学陈荣富教授著，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成果，全书65万字。

本书在中国佛教发展的大背景下展现浙江佛教发展的个性。以年代为序，以佛教宗派为脉络，纵横交错，史论结合，系统全面地叙述了浙江佛教的发展史。全书除导论外，分为九章：第一章，三国两晋南北朝的浙江佛教；第二章，隋唐浙江佛教的兴盛；第三章，吴越国时期的浙江佛教；第四章，宋代浙江佛教；第五章，元代浙江佛教；第六章，明代浙江佛教；第七章，清代浙江佛教；第八章，近代浙江佛教；第九章，现代浙江佛教。每一章大体包括当朝佛教发展的社会政治经济思想文化背景，当朝兴建的主要寺庙，佛教各宗派发展的状况，主要高僧及其佛学思想，重要佛学著作的评述。居士佛教发展状况，中外佛教文化交流情况等。

以下诸点是本书第一次完成或加以拓展的。

一、对佛教何时传入浙江以及传入路线的考证，本书列出四项史实证明佛教从东汉末年就已传入浙江并证明传入路线有陆路和水路两条

陆路也称为北路，即通过陆上“丝绸之路”从中国北方传入浙江，东汉末年最早到浙江传教的是安息国名僧安世高，继之南下且影响巨大的是名僧支谦。水陆也称南路，则通过海上“丝绸之路”，由中印度经交趾，浮海至会稽（绍兴）传入浙江，或由交趾至浙江古镇章安传入。其中最著名的代表是天竺僧人康僧会，他对浙江佛教的传播起了重大作用。

二、对于中国佛教“八宗”即天台宗、三论宗、法相宗、华严宗、禅宗、净土宗、律宗、密宗在浙江的传播与发展作了全面叙述，填补了过去浙江除天台宗外其他各宗几乎没有研究的空白，特别是对天台宗、禅宗、净土宗的叙述尤为详细

两晋南北朝时，中国文化南移，浙江实际上成为当时中国佛教文化中心。在中国佛教史上，这个时期佛教史上的重要人物，大都活动于浙东。隋代天台宗的创立，更突现了浙江佛教在全国的地位。智顗把“北禅”和“南义”融合成“止观并重”的一乘佛教天台宗，成为中国成立最早的一个佛教宗派。它典籍丰富，理论体系深厚，受到隋朝统治者的大力支持和扶植，是当时最有势力、最有影响的一个佛教宗派，对中国佛教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智顗入灭后，起承上启下作用的灌顶大师，唐代中叶中兴天台宗的湛然大师，唐末把天台宗传授给日僧最澄的道邃大师，宋代复兴天台宗的义寂、义通、遵式、知礼等大师，明代中兴天台宗的传灯大师、智旭大师，近代弘传天台宗的谛闲大师、宝静大师等都是浙江高僧。

在禅宗发展的历史上浙江禅师更是层出不穷。牛头禅在禅宗历史上起了重要作用，牛头禅发源于江苏，但主要在浙江发展，其著名禅师有杭州余杭径山寺法钦，唐代宗手诏赐“国一国师”号，还有道林禅师、惟则禅师等。禅宗的真正创始人慧能门下有五大宗匠，即青原行思、南岳怀让、菏泽神会、永嘉玄觉、南阳慧忠。其中永嘉玄觉和南阳慧忠都是浙江高僧。玄觉禅师系浙江永嘉（今温州）人，其所著《永嘉集》、《证道歌》是禅宗史上的重要著作。禅宗在发展中形成“五家”，即沩仰宗、临济宗、曹洞宗、云门宗、法眼宗。在这一发展过程中，浙江高僧同样发挥了重要作用。在青原系发展史上起关键作用的道悟禅师是浙江东阳人；曹洞宗的创始人洞山良价是越州诸暨人；云门宗创始人云门文偃是浙江嘉兴人；法眼宗的创始人法眼文益是浙江余杭人；使法眼宗在吴越国盛极一时的德韶国师是处州龙泉（今浙江龙泉县）人，他被钱王奉为国师；被誉为“曹溪后第一人”的永明延寿禅师是浙江余杭人，其洋洋八十万言的著作《宗镜录》和《万善同归集》是禅宗史上的重要著作。宋代以后禅宗主要是临济宗和曹洞宗，浙江是其最主要的活动地区。在浙江活动的临济宗高僧有宋代的爱国僧人大慧宗杲、无准师范；元代的高峰原妙、中峰明本、云峰妙高、元叟行端等；明代的楚石梵琦、愚庵智及、觉原慧昙、季潭宗泐等；在浙江弘传曹洞宗的高僧有天童正觉、真歇清了、天童如净等。

浙江是净土信仰最盛的省份之一。一般认为，净土宗的各代祖师是：慧远—善导—承远—法照—少康—延寿—省常—株宏—智旭—行策—实贤。在上述十一代祖师中，从第五代少康到第十一代实贤，全部主要活动于浙江。少康是浙江晋云县人，主要活动于浙江建德乌龙山；延寿是浙江余杭人，主要活动于杭州；省常是浙江钱塘（今杭州）人，在杭州昭庆寺结“净行社”；株宏是杭州仁和（今属杭州）人，居杭州云栖寺；智旭是江苏吴县人，主要活动于浙江，晚年居浙江灵峰；行策是江苏宜兴人，曾长期在杭州弘传净土法门；实贤是江苏常熟人，24岁在杭州昭庆寺受具足戒后，一直活动于浙江；近代净土宗大师印光曾在浙江普陀山居住25年，其许多弘传净土的著述都是在普陀山完成的。

南山律宗创始人道宣是浙江吴兴（今湖州）人，其最信任的弟子文纲是浙江会稽（今绍兴）人，文纲最负盛名的弟子道岸常居会稽成兴寺。正是通过文纲、道岸及其弟子的弘传，南山律宗才得以盛行。五代以后全国律宗的中心移至杭州，在杭州弘律的著名律师是大昭庆寺的允堪和元照。近代专注弘传律宗的是浙江高僧弘一法师。

武则天时期，法藏和尚创立华严宗后，不久便面临夭折。在华严宗的历史上起拨乱反正、承上启下的作用，使华严宗得以继续弘传的高僧是杭州灵隐寺法铤和尚的弟子、越州（今绍兴）人澄观。宋代复兴华严宗，使之再度辉煌的是杭州慧因寺（即高丽寺）净源大师。

三、对在中华佛教史上占有极为重要地位、浙江佛教史上的许多重要著作，作了初步的研究和评介

浙江素有文化教育传统和著书立说的风气，佛门也是如此。

早在东晋，活动在浙江的“六家七宗”代表人物支遁等高僧就给我们留下了许多著作；隋代智大师为创天台宗，作了大量的理论准备，主要有“天台三大部”，即《法华玄义》、《法华文句》和《摩诃止观》，各20卷，共60卷；唐代中期，湛然法师为中兴天台宗，不仅对天台宗的基本理论，即天台三大部作了注释，并且根据新的情况发展了天台教义；宋代复兴天台宗的义寂、义通、知礼、智圆也多有著述。